

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： 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

本报记者 李纯一



近日，葛兆光教授将 20 年来纪念已逝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编选成集，以《余音》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文集纪念的前贤从晚清民国学人如沈曾植、王国维、陈寅恪，到有过交往的师长如周一良、金开诚、朱维铮等等。这些身处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知识人，如在巨浪中颠簸，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，但也正是在这个政局多变、刚启蒙又救亡的动荡时代，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，新发现遭遇新

学理，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，由此成就一批杰出学者。

前辈余荫犹在，沿着余波可溯流而上——这是葛兆光前几年的感觉。“但编这本集子时，我的心境却很苍凉，觉得前辈的身影，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，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。”在《余音》的序言里，葛兆光问那可以“绕梁三日不绝”的余音，“三日”之后去向何方。他有些无奈地自答：“余音”或成“绝响”，总会袅袅远去。



感受这些学人的心灵，信笔写下这些文字

文汇报：您在新书序言中提到王国维自沉后，陈寅恪与吴宓的一段对话。吴宓觉得，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，就像被车裂一样。这种感觉，不是那个年代的人，恐怕很难体会吧？

葛兆光：我书里写到的不少学者是晚清民国那一代，那个时代是所谓“三千年未有之巨变”，是一个时势动荡的时代。有些人习惯于旧的经验、旧的秩序和旧的礼仪，当他不能不面对现在变化得太快的陌生新世界时，就会觉得内心分裂。这里面大概最典型的的就是王国维，所谓“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”，不光讲文学与哲学，也是这种心情的写照。你读沈曾植、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诗歌，也都能感到这种内心的纠结。

但是，你说现代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肯定也有。比如说，从上世纪 80 年代过来的这一批人，他们也有这种纠结和冲突呀。80 年代刚刚从“文革”中走出来，出现一个“文化热”的时代，在历经劫难以后，大家都认定了一些新价值，觉得应当遵循和认同这些新价值。但是到了现在，世界变得很快，中国也变得很快，有人觉得那些价值已经过时了，甚至有人认为，为什么

我们要用这些价值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另找一套价值，这就让这一代人感到惊愕和纠结，这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。

每个人都会在旧世界和新世界、旧秩序和新秩序、旧习惯和新习惯中感到分裂。只不过社会变动越剧烈，这种内心的撕裂就越厉害。就像开车一样，如果慢慢拐弯，人不会感觉到什么，可拐弯太快了，人就会被甩出去。沈曾植、王国维、陈寅恪和吴宓他们，对这种时代变化感受到得更强烈，是因为他们对旧时的秩序、过去的传统、往昔的知识，还抱有理想和依恋，所以他们内心冲突比较大。当然，如果也是比较趋新的人，跟着时代走，甚至走在时代潮流之前的一些人，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。

文汇报：您书中所写学者，是出于什么做的人选？

葛兆光：我没有特别的选择，都是在学术研究中，要看这些学者的论著，或者这些学者的书信、日记、诗歌，有感而发信笔写下来的。当然，也许是受到 1990 年代学界风气的影响吧，我写这些纪念前辈学者的文章，大多数在 1990 年以后。那时大家都最热衷讨论这一批曾经被政治遮蔽、忽略、被边缘化的学人，虽然我也并不见得完全同意这些学者的想法，但我感觉这些学人的内心痛苦最深刻，所以，我常常在读书的时候，随手写下这些文字。当然，也和我当时做禅宗史、道教史有一点儿关系，像杨文会、沈曾植、王国维、陈寅恪他们，都是我自己研究的时候要常常翻阅的论著的作者。1990 年代，这一批

学人被发掘得比较多。当然，我这里面没有写胡适，没有写傅斯年，可能是因为相对来说，他们这些人内心的新旧冲突，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那么大。胡适、傅斯年他们，大体上接受新时代，接受新理想。当然，时势变化也会影响到这些被称为“趋新”的学者，比如我写的顾颉刚，他在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时代，也一样“徘徊到纠结”嘛。

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清楚，1990 年代也有些特殊背景。如果说，1980 年代的“文化热”，是以传统文化来讨论现实政治，到了 1990 年代，环境变了，好像有个“学术史热”，其实就是转而以学术史、学者来谈论对现实的感受。所以，那个时候的“文化英雄”，突然变成王国维、陈寅恪这些看上去学问专精、思想矛盾、情感复杂的学者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其实 1990 年代还是延续了 1980 年代。也许有人不太理解，为什么这样，比如李泽厚先生就说学术上天、思想落地，或者学问家凸显、思想家淡出。真的吗？其实我觉得他没有看破这一点。

比如说吧，当时讨论王国维，大多数人注意的都是王国维“义不食周粟”，往昆明湖里一跳。但我坦率地说，那个时代讨论王国维的人，其实对王国维的学术了解得并不多，他们懂他的甲骨之学、蒙元辽金之史吗？讨论陈寅恪，他们懂陈寅恪的那些多种语言的佛经对勘、蒙元史或者后来的中古史吗？其实当时讨论最多的，都是他在《王观堂纪念碑》里面讲的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等等。

当然，对这类讨论，我也是部分赞成的，学者的生命史、思想史、情感史，是他们的一半，而我觉得这还不是学术史，另一半还是应该讨论他的专业、他的学术、他在现代学术转型中的位置，所以，你看我的《序》里面就特意讲了一段这个意思。

文汇报：稍后一辈的学者，比如季美林先生，他和陈寅恪一样，在德国也是学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。陈寅恪看到西洋学问的超迈精彩，但还是想要恪守学术上的民族本位，自己走出一条新路；而季美林如果没有后来“文革”的干扰，应该会一直在语言学的路上走下去。是不是可以说，相较而言，由于各种原因，稍年轻一辈的季先生身上没有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担？对时代环境的反应，也与陈寅恪有所差别？

葛兆光：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看法。我对现在外界对季先生的有些非议，是不太同意的。我一直觉得季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学者。而且季先生跟陈寅恪先生，在学术上、思想上还是有不少取向一致之处。

你知道，陈寅恪最早回到国内，在清华教的是欧洲东方学的目录学和佛教经典对勘等课程。他刚回国的那几年发表的文章，跟后来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时候，像《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》、包括蒙元史的系列研究，可以看出，他关心的还是中外宗教、语言和历史。季先生也是这样，季先生回国以后，最早有影响的论文是《浮屠与佛》，部分靠的也是在德国学到的历史学和语言

学方法。

当然，陈寅恪先生在抗战爆发以后，学术重心有一些转向，转到中古史这一块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抗战之后，有关四裔历史和语言的资料不太好弄。我看到最近有人发现一些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，就说到要史语所买书，他说，至少要和日本学者一样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和论著，才能和日本东洋学竞争。可是，当时中国的条件可能不足，战争又起来了，是不是因为这一点，他转向中古史？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，他也觉得中古史有一些关系到现代中国社会、种族、政治、宗教的问题也相当重

(下转 3 版) ➡

策划：

文汇报理评部

执行编辑：

任思蕴 rsy@whb.cn

封面图片：

吴郡真率会图(局部),左一为顾文彬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汇报学人

